

《沧浪之水》与湖湘社区人格

钟友循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5)

摘要:《沧浪之水》中所反映出来的湖湘社区人格包括智慧、修养、德行三个方面。智慧方面,集中体现在“官场决定论”“权威决定权”“规则决定论”的观念,以及相对主义、现世主义、功利主义、操作主义的实践上;修养方面,表现为做事圆通,性格柔顺,行事有度,懂得节制,谦和恭敬,含蓄委婉;德行方面,比如虽行小伪、小恶、小丑,但又向真、向善、向美,谨守一定的道德底线。其总的特点是理性、务实,融中国文化的共性于湖湘文化的个性特质之中。

关键词:《沧浪之水》; 湖湘社区人格; 智慧; 修养; 德行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1-0108-04

在《《沧浪之水》与当代湖湘文化》一文中,我曾就人事、情理、学问等三个方面,谈到了湖湘社区人格的具体形态。本文是该文的延续与补充,也谈三个方面,即智慧、修养、德行。我认为它们都足以反映湖湘社区人格的某些个性特质。

一、智慧

在《沧浪之水》中,湖湘人的智慧被表现得相当充分。一在文本中,一在文本外;既包括了书中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也包括了书外人物,尤其是作家自己。而且,无论是在思想、心理、言论、行动中,总之人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方面,这种智慧都在顽强地放射着它的“光辉”。但是,必须同时指出,一则书中各类湖湘人物的智慧之程度有别,比如说,没文化的底层即在“下面”的人物,尽管也有智慧,但却是“小智慧”,往往“无效”,与有文化的高层即在“上面”的人物之屡屡“有效”的“大智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结果便是,同样在人生中“苦斗”,前者是“失败”者,后者是“成功”者。但其衡量尺度与外部标志,实际上又只有一个,即看这两类人物是否如愿以偿地升了官,发了财。故尔,其“失败”或“成功”云云,又可以另说。二则书外各类湖湘人物的智慧之性质有别。比如说,作家阎真本人与他四周的某些人物,其各自的智慧就不属于同一品格。有的是“文人”的,有的是“官人”的;有的是“低人”

的,有的是“高人”的;有的是“好人”的,有的是“猪人”“狗人”“小人”的——以池大为而论,其早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时,属于前者,而后来“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时,则属于后者。关键在于他是“坚守”,还是“放弃”。若“坚守”,则四面楚歌,事事、时时、处处碰壁,且碰得头破血流,若“放弃”,便平步青云。其结果便是,同样有过人的智慧,前者是“失败”者,后者是“成功”者。一个将因之而清贫、孤独、苦恼、困惑,一个则因之而富庶、热闹、甜美、安逸。然而,其衡量尺度与外部标志实际也只有一个,即看这两类人物是否“入乡随俗”地掌了权,赚了钱。故尔,所谓“失败”或者“成功”,要看其智慧用在了何处。《沧浪之水》通过池大为的“转型”,极其生动、形象地揭示了上述事实及其中所隐藏着的奥秘——有人称之为“道破天机”,不对,应当说是“曝光地机”。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是普及得不能再普及了的中国现象和湖湘现象,人们或者装聋作哑,或者见怪不怪,总之尽管心知肚明,却一律沉默是金,谁都不肯“曝光地机”,阎真一说出来,就成了“道破天机”。就其洞若观火而言,阎真够智慧;就其“不识时务”而言,阎真的智慧与另一种流行的、时尚的、不脛而走的、如火如荼的智慧,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但阎真的确用他独特的、湖湘“文人”的智慧,写出了同样独特的、湖湘“官人”的智慧:“大智者”的“大智慧”。

在《沧浪之水》里,以池大为、晏之鹤、马垂章等等为代表的湖湘人主要是湖湘官场上的精英人物,

其最足以体现出湖湘社区人格的“大智慧”，即其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是将自己的不同情形的“成功”建立在其共同而又充分的理性追求与务实精神之上的。

湖湘人爱做学问，讲究“经世致用”。在《沧浪之水》中的上述三人身上，这一特点显得最为突出。但其间又有差异，如马垂章是实干家，晏之鹤是好导师，池大为是高材生。但全都是“大智者”。

“沧浪之水”中的“成功”人士如马、晏、池三人的实践表明，他们各自之所以能够或者为“后来人”做出“光辉榜样”，或者以其“官场秘笈”点拨出杰出弟子，或者甚至在“实践”与“理论”方面分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使两位乃师均相形逊色，是在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作为其“成功”实践的理论基础——这实际上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现代思想体系”，我称之为“湖湘厚黑学”。其核心观点即“官场决定论”“权钱决定论”“规则决定论”，而其内涵与外延都丰富、复杂得无以复加，欲穷尽之甚至粗通之都相当困难，必须活到老学到老才行。其大意为：人的幸福，取决于在官场中的“位了”；“位了”即权，“权就是全”，有权就有一切，但权须用钱来买，买到了权，才能大把大把地赚钱；但一定要讲规则，规则“就是要站在掌权的那个人的角度考虑一切问题”，否则你就只能“出局”，一旦“出局”，或未能“入局”，什么“远大前途”全玩完。

另外，你还必须掌握一整套独特的行动方针，并把它运用得游刃有余，天衣无缝。这就是相对主义、现世主义、功利主义、操作主义。相对主义即相信“没有道理就是其中的道理”；现世主义即如今是“兑现的时代，到了手就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功利主义即“只有现实的，才是真实的”，“道理是假的，利益是真的”；操作主义即千万不要背道德和“良知的包袱”，“当一切都在消费欲望的平台上展开，人们就再也不能去想象什么天下千秋”，“每一次操作都是为了让别人出局而自己入局”。你必须如此，才能像最杰出的“大智者”池大为那样，运用自己的“大智慧”，高居于芸芸众生头顶，成为人上人。

二、修养

在《沧浪之水》中，包括马垂章、池大为在内的几乎所有“大人物”都不像我们在别的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要么光环笼罩，浑身亮堂，要么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不是圣贤就是恶棍。马、池等人尽管居心叵测、行为不端，但从不张牙舞爪、凶神恶煞。他们都是极其有修养的，一个个和蔼亲切、平易近人，尽管他们可能正对你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其行

为特征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口蜜腹剑，绵里藏针，总之是言行不一，心口不一，声东击西，暗度陈仓。这是湖湘“官人”极具生存智慧的外在人文标记。

池大为自始至终何曾在心底里对马垂章有一丝一毫的喜欢与尊敬？但自从他“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后，他又何曾在行为上对马垂章有一丝一毫的不谦和不恭敬？要紧的是，他的这种表现只不过是浩瀚官海中如蚁人群里的一个绝不显眼的个例。在整个官场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池大为起初最轻蔑、最厌恶丁小槐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他自己一旦“觉悟”了之后，做起同样为人所不齿的事情来时，其娴熟、精到、周密、高妙的程度却又是丁小槐们修炼一辈子也做不到的。但书中的人们不仅不讨厌他、唾弃他的所作所为，反倒喜欢他、尊敬他的这一类表现；连书外的人们，包括《沧浪之水》的许多读者、爱好者，甚至作家阎真本人，也似乎同样如此。阎真说，他对这些人充满了“同情与理解”。湖湘人，尤其是像池大为、晏之鹤、马垂章这样以“儒雅”面貌著称于天下的湖湘官场中人，的确是可爱的。而其可爱，根源于修养好，做人圆通，性格柔顺，行事有度，懂得节制。远一点说，我们可以断定这是被悠久、深厚的湖湘文化传统所养育和锻造出来的：湖湘人社区性格中的谨小慎微、守己让人、内方外圆、似恭实倨不是没来由的。他们聪明、机敏、勤勉、坚韧，而又要强、倔犟、刚毅、顽强，长期经受屈原式爱国忠君精神的熏陶，同时又长期被视为另类，被排斥在朝廷——政治中心和正统文化中心之外；由于自身文化积淀相当独特而厚实，“湖湘学”及其所创造过的奇观和所培养出来的巨子曾经举世无双。何况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的哪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不是以布衣身份而号令天下的湖湘人所导演，由其豪气干云器度昂扬的广大子弟所推动的？他们曾经饱受歧视，久经磨难，又曾叱咤风云，笑傲天下，他们的践履崇实、经世致用之道，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如此智慧，能够没有修养吗？这是一种自信心、自负心的表现，而且是“大智者”的“大智慧”所孕育和催生出来的自信与自负：他们有足够的智力与才干去应付一切、征服一切，完全无须鲁莽。

在《沧浪之水》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是一场激烈、尖锐、紧张、微妙的智力竞赛，犹如下围棋，无声，有序，但却充满了冲突与对抗、斗争与搏杀。棋手们一律谨守规则，严遵章法，相信逻辑，极富智慧，极有修养。之所以如此，不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应当说，更是由于“本能”的

驱使。这是一般中国人的生存本能,但更是绝大多数湖湘人的性格本能。

然而内在的紧张与外在的松弛、骨子里的残酷与表面上的温柔,毕竟具有矛盾对立的意味。这就不可能不造成如下的现象:越是“看上去很美”的东西,越是“美”得极不自然极不真实。池大为几乎无时无刻不有的心灵困惑、苦闷、迷惘、内疚、犹疑、动摇、失落等精神感受,应当就是由这一矛盾造成的。《沧浪之水》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特别多,特别丰富,特别复杂,特别执着,特别“剪不断,理还乱”,这与湖湘人的智慧、修养有关,与这种因其智慧、修养所带来的内外矛盾的客观必然性也有关。它同时还使得当事人——智慧而又极有修养的湖湘人的性格形态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况,这也是其精神人格上的分裂。几乎所有《沧浪之水》中的湖湘“官人”,都在其自身行为上做到了统一与和谐,又都给人以不老实、不诚实的印象。也许严格地说,他们,至少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不老实、不诚实的;至少可能在主观上、心理愿望上、精神与道德需求上,乃至本质上,不是如此。甚至他们的动机、意图、目标、理想,也许恰恰相反:不但努力寻求自身的统一与和谐,同时还努力寻求自身与他人、自身与环境即社会、时代、现实、世界的统一与和谐。但可以说,就其现状,就其包括了上述智慧与修养在内的既定性格与文化人格形态而言,这种种统一与和谐目标的实现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上述种种现象及其所带来的心灵痛苦的实际表现,也就同样是无法消除的。

中国古来的人格修养之现实归宿有两个,一曰入世,一曰出世。入世有积极的,即“天下意识,千秋情怀”;有消极的,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池大为放弃坚守之后,已经从“做个好人”的原初理想上后退,从而主动、坚决地挤进了“猪人”“狗人”“小人”的行列。出世也有积极的,即“出污泥而不染”,真正的清高孤傲;有消极的,即“苟全性命于乱世”,虚假的清高孤傲。池大为在二者均取其消极一途的意义上,是自足、完整的;但他不甘于此,竟企图在入世与出世中,各取一个,以积极的假象,走消极的道路,要“智慧”而有“修养”,这当然做不到。

三、德行

这样,《沧浪之水》中不断地让池大为反复咀嚼自己的内心矛盾与痛苦的文字,就有了某种特别的意义。这实际上是作家阎真用自己湖湘“文人”所特有的侠骨柔肠,在为池大为们的堕落表示深深的惋惜。这种惋惜建立在他努力“同情与理解”这些湖湘

“官人”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温情与感伤的审美情调,从而反映出湖湘真正清高孤傲的知识分子性格中难得的善良。书中每写及此,书卷气、书呆子气就情不自禁地油然而生,甚至还自觉地使这些描写湖湘俗人(真正的俗人,比没文化的“俗人”更俗的俗人)的笔墨,不由自主地掺进了美丽的诗意。如池大为在“平安夜”的出游,以及全书结尾池大为一边向父亲诀别,一边抒发深长感慨的文字,应当说都是这方面活生生的例证。对此,笔者当然认为这纯属一厢情愿。因为像池大为(以及晏之鹤、马垂章)这样极为理性、务实的湖湘“官人”,当他们选定自己“新”的人生目标的时候,其灵魂里是冒不出这种温情、感伤的审美情调与人文诗意的。应当说,阎真之所以要这样做,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湖湘人之所以为湖湘人,除了其过人智慧与修养之外,的确也在于他们有永恒的德行。

尽管我们认为池大为的由“坚守”到“放弃”,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到“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转型”,实际上只能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堕落,但正因为这种堕落是理性和务实的(至少就他们自己而言),也就可以说是别无选择,确属不得已而为之的。《沧浪之水》中的大量描写和抒发主体(即主人公以及创造了这样的主人公的作者)内心矛盾与痛苦的文字,证明了这一点。这类文字在我看来,具有双重的意指功能和文化品格。一方面,在作家的自指层面上,它是真实的、合情合理的,而在对人物的所指层面上,它是虚悬的、违情悖理的;另一方面,如果作为“曾有的实事”,我以为不可信,但假若作为“会有的实情”的话,我以为又可信。但我必须把此处“实情”的能指解释清楚,即我认为《沧浪之水》中的所有这类文字,其文本价值主要是在于它们有一个集中的、共同的指向,那就是表明了池大为们决定实施“转型”之前,的确是有过一个实实在在的思想认识过程;惟其如此,才得以真实地反映湖湘人以理性、务实为重要特征,而且以此而表现出具有高度智慧与修养的性格风貌。同时,正因为有此“实情”,池大为们在其“转型”前后以及其全部人生过程中,才恰恰会用自己的全部所作所为来体现和反映湖湘社区人格中的德行特征,从而将自己与其他同类型中国人区别开来。

这类文字的实际内涵,我以为主要包含了如下3个方面:1)对于湖湘人,即便是像池大为这样“新”一代的湖湘人来说,让他们在一个早晨,哪怕是“新”时代的早晨,就果断、决绝地背弃传统,放弃操守,丢弃理想,确实是相当困难的。阎真为池大为安排了一个在其所处小环境中具有最高学历(硕士研究生)

的知识分子的“个人出身”，给他安排像晏之鹤这样的“隐士”和像马垂章这样的“博导”来做其恩师，安排像“卫生厅”这样的知识分子云集之地来作为其主要活动环境与文化空间，也许并不是刻意的。但至少客观效果上，这一切正如他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一样，具有了对上述内涵加以强调这种特殊的意义。

2) 即便“转型”了，它也是发生在池大为们努力认清现实，从而正视现实；努力认清时代，从而适应时代；努力认清世界，从而明了世界只不过是“死巷”“黑洞”“绝地”“深渊”；努力认清存在、终极、真实等，但却觉得一切都被“颠倒”了，自己根本无法把握，这种现象之后，在万般无奈之中所做的“被迫”的选择。

3) “转型”既成事实之后，池大为尽管行伪（小伪）、行恶（小恶）、行丑（小丑），在其心里仍然有着一条不肯放弃的道德底线，依旧是、始终是向真、向善、向美（虽然是有限度，即以不违犯官场规则为前提），并“还是想当个好官，做点好事”的。这当然更说明在其心里仍然有，甚至永远有着一条不肯放弃的道德底线。这3个方面的内涵，不但在池大为的所有表现中的确被印证了；而且在其他所有湖湘人，无论是在“上面”的“大人物”，还是在“下面”的“小人物”的所有表现中，也一样都被印证了。当然，他们不一定，事实上也不可能都采取与池大为一样的方式来印证自己的这种德行。但无论怎么“转型”，怎么“变”，怎么“放弃”，怎么堕落、沉沦、潦倒，作为湖湘人，其德行都永远会有一个堪称坚硬的内核，再“坏”的湖湘人，也绝对不会太“坏”。

假如稍稍做点引中或发挥的话，在这种德行里面，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某些核心观念与固有立场在湖湘社区人格当中是被保留下

来了的，比如“仁者爱人”。当然，《沧浪之水》中的所有湖湘人，首先是爱己，但是人们看到，在不妨害、阻碍爱己的情况下，他们的确还是或可能是“爱人”的。再比如“克己复礼”。规则、章法、逻辑、道理，在《沧浪之水》中人物的嘴里，颇为常见，而且均对之非常虔敬，它们实际上都是“礼”。至于“克己”，在全中国，即使是在早已“现代化”了的今天，没有比湖湘人做得更好的了，包括那些业已追随时尚，对自己进行了“现代化”包装的新一代湖湘人（为了“经世致用”，湖湘人是比任何其他中国人更能够“正心诚意”和“修身齐家”的）。另一方面，湖湘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重要的精神积淀与思维、行为特征和道德、伦理原则，更是未被放弃。湖湘是理学大师的故乡，是“湖湘学”的永恒家园，是王夫之、曾国藩借以生长并成功的温室，这些都很重要。湖湘社区人格的当代特征，不可能不与其遗传基因发生渊源关系。当然，对于前人所留下来的文化财富，也可能有所扬弃，有所改造。比如从《沧浪之水》来看，如今的湖湘人，是不再肯“灭人欲”了，但却一定要“存天理”——从来不被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视为正统的湖湘人，因其要强、倔犟、刚毅、顽强、聪明、机敏、勤勉、坚韧以及圆通与柔顺，偏偏在这两个方面特别争气，并有辉煌的业绩。而其智慧、修养、德行等人格特质均与此有关。

不能说上述种种就是湖湘社区人格的全部，它们充其量只是其中的某些侧面，但确是重要的侧面。其中蕴藏着并从而能够反映出湖湘文化尤其是当代湖湘文化的丰富信息。阎真在《沧浪之水》中，把湖湘人及其社区人格放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来加以观察，是其情甚切、含义甚深的。

Kaleidoscope and Hunan community characters

ZHONG Youx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Abstract: *Kaleidoscope* sums up Hunan community characters as follows: wisdom, which lies in the idea of political trickery, money and power, rules and the relevant practice in relativism, utilitarianism, operationalism and realism; self-cultivation, which includes obedience and self-reservation; virtue, which consists chiefly in honesty, goodness and perfection, though there exists a small tendency to immorality, dishonesty and wickednes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rationality and practicality in the whole Chinese is mixed together with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 of the Hunanese.

Key words: *Kaleidoscope*; Hunan community character; wisdom; self-cultivation; virtue